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视阈下的中学历史教学

——以人教版“宋明理学”一课为例

◎ 徐文彬 江苏省如东县马塘中学

中学历史教学承载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但不能生搬硬套，而应该从课程资源整合、教学内容选择、问题设计等方面将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潜移默化地渗透给学生。本文以人教版“宋明理学”一课为例，阐明如何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开发课程资源，组织教学内容。

一、关于理学产生的背景应该突出理学家们的社会责任感

人教版关于理学产生的背景主要叙述的是魏晋至隋唐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强调佛道思想对儒学正统地位的挑战。如果按照上述逻辑

讲宋明理学产生的背景，就会形成新的问题：理学兴起的外因是佛道思想的挑战，内因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教师去阅读唐中期至北宋初期的儒家如韩愈、胡瑗、周敦颐、张载、程颐等人的著作，寻找他们复兴儒学的动机。魏晋以来由于门阀士族的崛起，九品中正制度的推行，许多寒士入世无门，或寄情山水，或醉心佛道，这使得儒学神学化趋势加强，玄学就是这种趋势的产物。无论是玄学还是佛道都有不切实际的一面，这与先秦儒学是背道而驰的。知识分子消极避世、崇尚清静的价值追求并不利于社会发展。从韩愈至朱熹，唐宋间出现了一批弘扬儒家道统，关心政治与民生的儒学大师，他们意识到匡时济世必须重塑人们的精神世界，尤其是

个人主义，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传统。

——李海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比较》

探究问题：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有何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从材料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侧重于民族的救亡图存，强调个人价值与民族利益相结合，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则侧重于个人主义，重视个性解放和个人价值。之所以会产生这些差异，主要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产生是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和必然要求，而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人文主义则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爱国志士们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结果。

总之，时空观念对准确理解历史概念，构建历史联系，进而正确认识历史规律有着基础性的作用。

重返具体时空，挖掘历史概念与时空背景的内在联系，加深对历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建构阶段时空，侧重时序观念，在动态的时空发展中理解历史概念的发展演变；联系特定时空，侧重空间观念，还原历史概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目前，如何运用刚颁布的新课程标准指导具体的教学实践，以达成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目标，是一线教师应该积极面对的问题。上述实践只是笔者对运用时空观念进行历史概念教学的一次尝试，愿为抛砖引玉。

【注释】

[1] 聂幼犁：《历史课程与教学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2] 赵恒烈：《如何纠正学生掌握的历史概念中的常见错误》，《历史教学》1963年第5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5页。

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比如程颐在一次聚会后就产生了复兴儒学的自觉：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惟当自明其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1]

程颐身上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在精神内核上与儒家原旨实现了对接，成为理学的价值追求，最终使得理学从三教合一的潮流中脱颖而出。所以在讲解理学兴起的背景时，可以适当补充一些材料，说明唐宋时期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儒学大师，他们希望通过抨击佛道，完善儒学，重建人们的精神世界。

二、关于理学的思想内涵应该挖掘其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

宋明理学是非常广大而精微的哲学体系，中学生是很难理清、理解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的。笔者认为，这部分内容宜删繁就简，把重点放在挖掘理学思想中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有积极意义的内容。

1. 修身为本的道德自律

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天理。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要求人们以修身为本，通过道德自律，来彰显天理。这对于提高人的修养，维护人格尊严，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材料1：（弟子）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朱熹）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朱子语类》

师：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分别是什么，两者的关系如何？

生：天理指人正当的欲求，人欲指过分的欲求；两者的关系是“存天理，灭人欲”。

师：朱熹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何在呢？

生：过分的欲求容易使人超越道德界线，他倡导“存天理，灭人欲”是希望人们加强自律和节制。

通过这则材料，让学生明白“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所在，而不是从字面去分析。教师再适当补充南宋社会的奢靡之风，就更能让学生理解这一思

想在当时的社会意义了。

2. 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理学家以孔孟儒学为正宗，故特别强调治国安民的实际功用，反对佛道的虚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塑造中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材料2：“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大学》

师：朱熹编写了《四书章句集注》，《大学》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格物致知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生：对个人来说就是“修身”，对社会来说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师：朱熹认为读书是格物致知的一种途径，因此读书是为了什么呢？

通过这则材料的分析，学生很容易感受到理学思想中的家国情怀，从中受到感染，课堂中自然而然地实现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引领。

3. 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阳明心学上承孟子性善论，提出“心外无理”、“心即理”的命题，并由此提出“良知说”，认为良知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良知学说使得凡夫俗子的价值得到彰显，具有打破权威的倾向。同时心学地位的确立是通过程朱理学的批判实现的，因此也需要打破外在权威。所以阳明心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打破权威。

材料3：“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传习录》

笔者认为，补充上述材料，学生就能理解心学倡导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的理性精神，对学生的学习态度也是一种引导。同时，为下一课讲解李贽的思想提供铺垫，李贽的离经叛道固然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但从师承关系看，心学是李贽思想的渊源。

4. 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

王阳明认为知和行都产生于心，两者不可分割，知而不行就是不知。由此可见，阳明心学的道德实践并不是空谈，而是力行，后来出现空谈心性的现象并不能归咎于阳明心学。

材料4：（黄）直曰：“知行自是合一。如今能行孝，方谓之知孝；能行弟，方谓之知弟。不是只晓得个孝字弟字，遽谓之知。”先生曰：“尔说固是。”

——《传习录拾遗》

通过上述材料的分析，学生自然明白，知行合一的关键是道德实践，而不是口头说说，所以心学对于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作用更大。

挖掘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时要体现时代性，同时也要注意客观性，不能牵强附会，不能刻意回避其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三、关于理学的影响要突出理学完成了儒学的世俗化

任世江先生认为，“理学对后世的最大影响绝不是‘理’‘气’等深奥的哲理，而是对儒家伦理道德标准的丰富及其普及化、通俗化。”^[1]朱熹将理学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中下层知识分子层面，而王阳明则“将普遍的道德要求从上往下逐层地分摊下去，使道德的承担者不仅是高层的士大夫和官僚，并且要扩大到乡村、城市中的绅衿与农民、商贾与市民”，^[2]至此，儒学走完了其世俗化的历程，真正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人的宗教。笔者认为在讲授宋明理学的影响时应该突出理学世俗化的过程，所以主要呈现了以下材料：

材料5：一组图片：（朱熹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家礼》《小学集注》《童蒙须知》）

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说话：凡为人子弟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

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

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

——译编自朱熹《童蒙须知》

师：朱熹用理学思想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家礼》影响巨大，《童蒙须知》更是儿童教育的必读书目。从《童蒙须知》可以看出，朱熹传播理学思想方面有何特点？

生：重视教育；注重将儒家道德规范生活化。

材料6：王阳明在南赣建立起一种乡村民众的自治组织“乡约”，并亲自撰写了约规，即《南赣乡约》。阳明的乡约模式强调格物致知，即格心中之物，同时见诸行动。《南赣乡约》颁行以后，赣县“人心大约淳正，急公输纳，守礼畏法。”

——摘编自程鹏飞《王阳明“知行合一”与南赣乡约》

师：与朱熹相比，王阳明传播心学思想方面有何特点？朱熹和王阳明对理学思想的传播有何积极影响？

生：特点：面向底层民众；更加重视道德行为。影响：使得儒家伦理道德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

通过上述两则材料的使用，可以使学生理解宋明理学倡导的伦理道德与汉唐儒学并无区别，但它把这些伦理道德变成了规则，变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常识，任何违背常识的行为都被视为伤天害理的罪孽，这才是理学统治几百年的根源。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教学内容有机结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深入研读教材内容，确定其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道德规则或人文精神，找到契合点；其次，选择符合时代、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最后，整合课程资源，采取适合的呈现方法，设计精巧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体悟。

【注释】

[1] 程颢，程颐：《二程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3页。

[2] 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第284页。

[3] 袁行霈、严文明等：《中华文明史》（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